臺大歷史學報第39期
2007年6月，頁369~384

BIBLID1012-8514(2007)39p.369-384
2007.4.23 收稿，2007.6.14 通過刊登

§書評§

後殖民研究的去脈絡化困境與轉機

述評荊子馨著，鄭力軒譯，《成為「日本人」——殖民地台灣與認同政治》臺北：麥田出版，2006，288頁。

蕭　明　禮*

一、前言

在日本統治時期臺灣史研究中，殖民統治下被殖民者的身分認同一直是相當尖銳卻又與當代極其切身相關的問題，正因為如此，有關日治時期臺灣人意識的形成，不斷成為學界關注的焦點。本書作者荊子馨（Leo T. S. Ching, 1962~），為美國杜克大學亞非語文學系教授，英文原著 *Becoming "Japanese": Colonial Taiwan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Formation* 由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於2001年出版。作者雖然出身文學領域，但不可諱言，近來的日治臺灣文化史研究，由文學作品的文本分析切入，進而析論臺灣人在殖民統治下錯綜複雜的自我認同意識之變化歷程，已是相當常見的研究取徑。因此，作為跨領域研究與對話，該書不僅僅是文學研究，並企圖從更全面的角度分析，1920年代到1945年間，臺灣政治與文化的認同意識如何被日本殖民者重新建構之過程。更重要的是，作者希望藉此釐清戰後超過半世紀以來，特別是在1980年代晚期，隨著威權體制轉型而蓬勃發展的臺灣認同與殖民體制的糾結關係，從而觸及當代臺灣人所面對最敏感的國族認同的源流。

本書自出版以來，即引起文學研究與臺灣史研究者的高度興趣及重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視。但該書對於日本殖民意識塑造的認知，是否真正貼近日治時期臺灣歷史的發展脈絡？其中又有多少歷史事實與理論間的落差，仍有待商榷。故筆者在引介該書的內容之外，將嘗試補充作者忽視的面向，藉以釐清作者所參考的理論和引用文本整合時產生的疑義。其次，將對照近來日治時期臺灣文化史研究類似議題的最新成果，以茲比較荊氏與其他研究者對於臺灣意識形成問題的見解。此外，筆者亦將從上述的介紹與分析出發，補充說明日治時期臺灣史與後殖民理論，以及東亞研究之間跨領域整合的個人看法。藉由橫向考察與對話，希望能使讀者在認識這本具話題性且觀點獨到的作品之餘，對殖民體制下臺灣文化與自我意識之多重性有更深刻的瞭解。最後，由於本書評僅就中譯本的文本內容加以分析、評論，所以該書翻譯品質之優劣或錯譯，並不在討論之列，尚請讀者包涵。

二、本書內容概要

本書分為前言、導論、一至五章之正文，以及參考書目四大部分。在〈導論：那些曾經是「日本人」的人們〉中，作者以一段具強烈衝突且關係緊張的故事，揭開整本書的序幕。那是 1979 年，經歷戰後三十多年歲月的臺灣原住民們，為了讓遠離原鄉、漂泊異域、在太平洋戰爭陣亡的族人靈魂得以安息，渡海前往日本，希望能迎回被奉祀在靖國神社中的靈魂，卻遭到神社以有違日本習俗而加以拒絕的事件。作者藉由這段生動的描述，刻劃出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在殖民統治結束逾三十年後，被迫再度面對殖民統治歷史創傷的尷尬情境。在作者筆下，原住民要求歸還漂泊在外數十年的親友魂魄，所隱喻的正是日本殖民臺灣半世紀的統治責任問題；神官拒絕原住民的要求，則象徵了前殖民帝國對此問題的迴避與漠視。藉此場景，作者鋪陳出該書將要處理的重要課題：在日本殖民體制下，殖民者建構被殖民者從屬身分時所隱含的支配關係之矛盾性，以及這種隱藏於「成為日本人」的意識背後的中國因素的制約，以致演變為戰後六十年來難以抹滅的衝突因素。

第一章〈殖民台灣——日本殖民主義．去殖民化．殖民研究的政治學〉，本章主題是探討日本帝國在 1895 年領有臺灣後，以其唯一非西方殖民帝國的特殊性與後進性格特徵，在施行治臺政策時所造成之影響。作者將日本佔領臺灣置於全球殖民主義地緣政治的特殊歷史脈絡下，批判將日本殖民主義視為純然有別於西方的特殊案例的主張。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受限於本身資源條件，擴張性資本累積不易，日本帝國主義只能在東北亞地區擴張勢力範圍，以致最重要的二個殖民地——臺灣與朝鮮，其人民種族與文化脈絡根源基本上實與日本殖民母國相似。但作者認為日本帝國形成的特殊性，並不意味著日本殖民主義在本質上就一定與其他國家不同。作者引用矢內原忠雄（1893~1961）在 1920 年代即已透徹觀察到的結果指出：日本帝國主義雖然處於資本主義較為落後的發展階段，但受到西方帝國爭奪世界領土的刺激，隨著日本國族意識的形成，一種互為帝國主義（inter-imperialist）的競爭意識逐步成形，是故在意識形態上已成為帝國主義國族（頁 46）。

而本章另一個重要論點，則是指出一般認為日本殖民帝國與被殖民者之間的文化類同性，是日本與其他殖民強權不同之處的假設，其實隱含著日本殖民者為了確立統治正當性，並區隔自身和西方帝國主義差異性的一種「地位優越性策略」（頁 49）。透過這種方式，日本殖民者藉由批判西方殖民帝國的侵略性，進而隱藏了日本殖民主義與其他殖民主義結構上的同質性。作者並在本章中批判了目前殖民論述研究及後殖民理論中對於日本殖民主義領域的缺乏。而這種現象的產生，必須追溯到太平洋戰爭結束後，日本遭到美軍佔領，以及冷戰體制的形成。在美國亞太戰略的構想下，殖民者原本應當對殖民統治與戰爭責任等問題所進行的反思，全部被冷戰對立的架構所掩蓋，使其擺脫了殖民統治的責任問題，從而導致日本對去殖民反省的缺乏。

第二章題為〈糾結的對立——殖民地台灣的認屬關係．認同身分與政治運動〉。本章回歸到日治時期臺灣人在殖民統治下展開反對運動，及其背後的認同因素。作者將這種政治運動稱為「新民族主義」

（neonationalism）或「原型民族主義」（protonationalism），[1]並認為其論述的構成，與 1920 至 1930 年代間圍繞著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民族主義的地緣政治衝突有關（頁 83）。1920 年代，臺灣本地政治菁英展開與殖民政府的政治抗爭時，不可避免地吸收了當時日本及中國最受矚目的思潮，因此作者將臺灣反殖民運動分為四大座標：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縱座標、中國——日本的橫座標形式（頁 87）。從這種圖式所顯現的臺灣新民族主義論述，實際上是多重的，是產生於日本殖民主義及中國民族主義疆界的模糊地帶，並且受到後二者在特定變化條件下的制約與侷限。事實上，臺灣總督府對 1930 年代臺灣社會運動的調查，即顯現當時臺灣民族主義運動與中國認同關係的曖昧與模糊性，甚至成為影響現今臺灣政治論述的關鍵作用之一。

基於對上述背景的認識，作者特別引述了居於戰後臺灣史研究光譜兩端的王曉波與宋澤萊兩人，分別針對其有關日治時期臺灣派祖國意識和臺灣意識的爭論加以批判。首先，作者指出王曉波論述中所建立的作為假設性的普遍整體的「中國」，無非只是一種在遭遇同為普遍性意識的「西方」，乃至「日本」的存在下的反應（頁 100）。相對地，宋澤萊以簡化的歷史唯物論批駁王曉波的論述，其實仍潛藏預設臺灣人意識早在前近代即已存在的唯心論式前提。而宋澤萊的理論基礎，又源自史明在《臺灣人四百年史》中所建構的，因為日本五十年殖民統治所形塑成的「具體」而「獨特」的臺灣意識。在這樣的二元觀之下，臺灣是具體的實有，中國只是抽象的虛無。要之，如果王曉波將漢族意識理想化，那麼宋澤萊、史明等人則是將特殊的臺灣意識物神化（頁 104）。作者更進一步質疑，史明的理論不能解釋虛幻的「中國」意識為何能在殖民地臺灣構成實在的物質基礎。更重要的是，作者點出了這種中國意識或臺灣意識的爭論，其實只是一種後殖民時代下的假設命題，而非生存於殖民時代歷史情境下的臺灣人所關注的課題。日治時期臺灣知識分子對

1 “Nationalism”一詞，國內學界早年多翻譯為民族主義，由於“Nationalism”還包含有在民族之上形成某種固定疆界的“state”組織的意涵在內，故近年的學術作品中將“Nationalism”譯為國族主義的情形有增加趨勢，本文則將民族主義與國族主義互用，但所指涉的概念相同。

中國的認同，比較傾向對殖民體制不滿，且無力改變現狀的反射。

實際上臺灣人的政治抗爭運動，必須放在一次大戰後殖民帝國及階級關係的對立，而非民族認同衝突的位置加以考察。因為殖民政府藉著將在地地主階級整編為臺灣政治與社會經濟的中介階級，使其成為殖民經濟的受益者，導致在地地主階級於 1920 年代民族意識覺醒之際，雖然不滿總督府的民族差別待遇政策，但為了維護自身利益，不願意支持更激進的革命運動。在這樣的複雜情緒下，臺灣殖民地的抗爭運動呈現出堅持自主的臺灣意識，卻又肯定這種意識可以整合進入日本帝國統治結構的矛盾現象。

第三章〈同化與皇民化之間——從殖民計畫到帝國臣民〉。在本章中，作者反對歷來研究將 1937 年開始實施的皇民化政策簡單地化約為同化政策之延續的看法。雖然殖民政府宣稱皇民化政策是同化的延伸，實際上作者從官方論述的破綻中，認定皇民化未曾明說之目的是徹底消滅被殖民者的傳統文化與認同。皇民化不只是要臺灣人變成「好的」日本人，更是為了在戰爭動員體制下，將臺灣人徹底塑造為可以天皇之名而死，成為日本魂的至誠子民，從而驅使殖民地人民成為皇軍將士的策略性手段。更重要的是，皇民化運動與同化政策關鍵上的區別在於：皇民化使得臺灣人的認同掙扎首次成為被殖民者的主要論述。作為被殖民的個體，臺灣人開始實際地面臨「成為日本人」這樣觸及生命最深處自我意識的敏感課題。對此，作者追溯日本在臺實施同化政策的 1910 年代末期，指出同化政策其實是日本殖民主義在面對一次大戰後民族自決浪潮下，用來區別日本殖民體制與西方帝國主義的差別，以及壓制臺灣本島菁英要求改革的修辭，意圖掩蓋被殖民者在政治、社會上的不平等處境。正因為同化與現實殖民地支配體制在本質上存有矛盾，為了緩和這種緊張關係的表面化，日本殖民主義在同化政策的論述上，藉著所謂臺灣人與日本人在人種、文化上相近的曖昧性，使自我／他者的界線模糊化，從而迴避了殖民－被殖民關係的尷尬現實。但在皇民化運動之下，殖民者不再允許這種曖昧的空間出現，作者使用相當的篇幅，處理皇民化時期代表作家周金波的小說〈志願兵〉文本，以及戰後研究者針對周金波及其他皇民文學作家的相關研究論著，藉以呈現當時臺灣人別無選擇，

「不當日本人不行」的認同掙扎。正因為皇民化運動將「日本化」的概念內化為被殖民者必須且唯一面對的問題，遂造成臺灣人被迫選擇自己是「日本人」或「臺灣人」的認同困境，而這種徹底轉變與限制殖民地認同的手段，其後續效應一直影響到今天。

在第四章〈從叛變者到志願兵——霧社事件以及對原住民的野蠻與文明再現〉，作者論述 1930 年霧社事件後，臺灣總督府重整原住民政策的過程中，原住民如何從野蠻、未開化的形象轉變為帝國子民的再現，其背後所隱含的殖民意識形態之調整。自該事件發生以來，相關的出版品至少超過兩百部，但相當部分是從「野蠻」與「文明」二元對立的意識出發，塑造日本與臺灣原住民的殖民關係（頁 193）。作者指出，不論是臺灣總督府 1934 年出版的《霧社事件誌》，乃至日本大眾黨議員河野密與河上丈太郎從揭露殖民統治獨裁專制性格出發的〈談霧社事件的真相〉，其實在最深層的意識上，都是植基於文明與野蠻的二元區分法。而霧社事件後，殖民者一則需要化解統治關係上的矛盾，再則因為逐步邁向戰時體制，亟需動員人力，使得原住民在政治與文化論述上呈現出不同的形象。不僅在《理番大綱》的政策面強調教化原住民成為帝國子民，以及將原住民的官方稱呼由「生蕃」改為「高砂族」；更重要的是，當時官方甚至藉由文學宣傳，重構出原住民在殖民體制下的新角色。在此作者引用了二篇相當重要的原住民故事文本：〈吳鳳的故事〉、〈沙韻之鐘〉，以茲比較霧社事件前後原住民形象的轉變。前者可視為 1930 年代前，日本殖民者藉由文本呈現原住民遭扭曲的負面形象，來反證殖民者具有文明的道德優越性。但在〈沙韻之鐘〉的敘事中，卻顯現出霧社事件後，原住民在「殖民恩澤」的「感化」下，自我奉獻犧牲的形象；藉此將原住民整合進日本國體之內，並掩蓋其身處殖民統治下，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正因為這種灌輸原住民「成為日本人」想像的操作發揮極大作用，使得戰後研究者在對戰時的「原住民志願兵」進行口述訪談時，[2]發現原本是反抗殖民體制者的後代，竟然成為天皇陛下最忠誠的戰

2 原書 223 頁，作者在討論 1943 年的電影《沙韻之鐘》時，提到了劇中原住民受徵召為「高砂義勇軍」前往戰場的一幕。事實上，作者所稱的「高砂義勇軍」，應為「高砂義

士。這種角色錯置的混亂，其實是因為在殖民體制最底層的原住民，只有讓自己比日本人還要更日本人，才有可能改變自身被野蠻與文明、殖民與被殖民、土著與日本人等種種枷鎖束縛的對立關係。

第五章是〈「在濁流中」——《亞細亞的孤兒》中的三重意識與殖民歷史學〉。本章針對吳濁流（1900~1976）的著名小說《亞細亞的孤兒》進行文本分析，藉以證明在殖民體制下，意識（consciousness）的重構是比認同政治更具歷史性的另類選擇。眾所周知，《亞細亞的孤兒》是吳濁流在太平洋戰爭期間冒著極大的危險所完成，而從書名的多次變更中，反映出臺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曖昧關係。其中，標題的「孤兒」一詞，清晰而有力地點明了臺灣在近代歷史上屢遭遺棄、孤立與隔絕的歷史境遇，同時也代表了臺灣與中國之間的高度爭議性。跳脫戰後各種對《亞細亞的孤兒》文本擷取性的解讀，作者指出，該書的本意乃是陳訴在日本殖民主義統治之後，臺灣人要想回歸到原初中國的本質，已是難以實現的道路。更進一步來說，日治時期臺灣近代知識分子所想像的中國意識，不過是源於殖民現代化下所帶來的抽象性概念，是一種在殖民統治下形塑而成的差異化認同。

但另一方面，作者最主要的批評並不是《亞細亞的孤兒》文本研究的扭曲化，而是將之擴大到近年來臺灣殖民文學研究在方法取徑及意識形態上的盲點。作者認為，即便是聲稱從後殖民、被殖民者主體性角度出發的研究論述，不是將臺灣文學當成中國文學研究的替代品，就是將重點放在被殖民者使用日語創作的部分，本質上還是以前殖民者立場去

勇隊」之誤；且高砂義勇隊自 1941 年實施以來，是以非軍人身分的「軍夫」前往戰場擔任運輸、後勤業務，直到在實戰過程中，發現原住民軍夫極適合在南洋叢林與山地環境中作戰，至 1943 年方開始徵召具有正式軍人身分的「高砂特別志願兵」。另外，在原書第 226 至 232 頁，作者引用戰後加藤邦彥與林英代（林えいたい，亦有譯作林榮代者）對參戰原住民訪問的語句中，亦將高砂義勇隊誤植為高砂義勇軍，並視為與志願兵具有相同身分。由此可知，作者對高砂義勇隊或高砂特別志願兵的正式名稱、性質及時間順序的關係認識不清。關於戰時體制下殖民政府對原住民的軍事動員，以及原住民由軍夫身分的高砂義勇隊轉變為正式軍人身分高砂特別志願兵的經過，可參見李國生，〈戰爭與臺灣人：殖民政府對臺灣的軍事人力動員（1937-1945）〉（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82~90、139~141。

認識作為他者的前被殖民者的概念。結果這種研究只是一種前殖民者自我貶抑及深感內疚心態的反射載體，被殖民者還是居於附屬地位，反而使殖民者支配被殖民者的他者形象更為突出，弔詭地強化了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論述。正因為殖民文學研究的爭議性及複雜性，所以作者認為必須將文本寫作者放置在日本—中國—臺灣（或稱為帝國—民族—殖民）這三角空間不斷移動的情境，以及當時人所處的歷史場域中，才能更精確地評估《亞細亞的孤兒》，乃至其他殖民文學作品呈現的意識形態。最後，作者藉由分析《亞細亞的孤兒》的結局，總結全書。該書的模糊結局反映出日本殖民主義下臺灣與中國曖昧的歷史連結與解離，並代表了日本殖民者藉由製造被殖民者認同掙扎的手段，來達到殖民主義的壓制性；而戰後所謂臺灣認同的形成，其實帶有某種歷史的偶然性。故作者認為必須從基進（radical）意識的角度出發，亦即藉由認清殖民主義形塑的排他性自我認同的本質，代之以多元認同，以「朝救贖的實踐而努力」（頁 277）。

三、研究觀點的商榷及反思：兼論以亞洲主義作為去殖民研究新取向的可能性

在《成為「日本人」》書中，作者認為日治時期臺灣意識的誕生，是一種殖民體制下的偶然性（contingency）認同。法農（Franz Fanon）在其《黑皮膚、白面具》（*Black Skin, White Masks*）一書中，曾提出法屬西印度群島被殖民者處於白人殖民者操作的認同焦慮與危機的論點。荊氏以類似該論點之模式，貫穿全文，[3]試圖證明受殖民統治的臺灣人，所面對的中國—日本—臺灣三者之間錯綜複雜的「孤兒意識」，實乃日本官方營造的產物，並對殖民統治進行批判。固然作者深刻論證了日本殖民主義建構的臺灣人認同焦慮對日後的影響，但在該書中仍有一些尚待釐清與重新辯證之處。同樣地，這部作品也預示了未來日治時期臺灣

3 F. Fanon 著，陳瑞樺譯，《黑皮膚、白面具》（臺北：心靈工坊文化事業，2005），228~240。

文化史研究可能的走向。以下將分別就此二方面提出分析與看法。

（一）研究理論的再檢討

首先，在該書近三百頁的篇幅中，所引用的相關研究多來自日本及歐美學者，很顯然的，作者對話的對象是日本殖民研究者，而非臺灣在地之相關研究者。作者在 2006 年接受的訪談中，自承其寫作的目標是要「批判日本在臺灣的殖民論述」。[4]話雖如此，作者卻很明顯地忽略了臺灣本土殖民研究者近年來所完成的豐碩成果。例如，第四章有關臺灣原住民如何從殖民體制的反抗者，轉變為戰時體制下殖民地軍事動員的先鋒，作者以〈沙韻之鐘〉作為殖民者重塑原住民形象，以配合將原住民整編進入皇軍軍事體系的策略。其實周婉窈早在 1990 年代初期起便已展開相關課題之研究，並對日本官方以此為主題塑造的宣傳形象有相當深入的分析。[5]作者未能與周婉窈的研究進行對話與深入探討，是本書缺憾之一。

其次，前述作者於第二章中使用四大座標系，劃分日治時期臺灣知識分子的反殖民運動，其實只要稍微細心的讀者很快就能發現，其座標系以意識形態與地理空間為基準的分類原則，強烈地隱藏著若林正丈 1987 年所提出之分析架構的影子。[6]雖然若林的四大座標理論極具創見，但近年已有研究者指出，若林對於 1920 年代臺灣民族認同的詮釋架構，忽略了當時臺灣民眾對於自我認同的曖昧與游移特性。[7]荊氏顯然也注意

4 有關荊子馨本人對於《成為「日本人」》一書寫作概念的答辯，以及他對後殖民議題在臺灣乃至東亞發展方向的補充性主張，可參見柯裕棻，〈去殖民與認同政治：訪談《成為「日本人」》作者荊子馨〉，收入《思想》編輯委員會，《歷史與現實》（《思想》第 2 期）（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6），259。筆者認為這篇訪談是原作者透露其寫作意識及關懷議題的重要文本。

5 關於周婉窈對〈沙韻之鐘〉及日本在臺軍事動員的分析，請參見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2003），13~32、127~184。

6 若林正丈，〈臺灣抗日運動中的「中國座標」與「臺灣座標」〉，《當代》17（1987，臺北），40~50。

7 方孝謙，《殖民地臺灣的認同摸索——從善書到小說的敘事分析，1895-1945》（臺北：巨流圖書，2001），80~93。

到了此一問題，才會在論證中指出，臺灣新民族主義論述蘊含著多重性與含混性的領域（頁 89）。但這種以上層知識分子為分類基準的框架，必然會與日治時期一般民眾的實際生活有所區別，進而導致作者對當時臺灣人認同本質的判斷出現歧異與落差。

實際上，作者在書中推論，由於伴隨著內地延長主義下同化政策的展開，身處殖民體制內的臺灣人開始一連串爭取政治權益的反殖民運動，導致「新民族主義」或「原型民族主義」興起。這樣的說法，我們可引用方孝謙的《殖民地臺灣的認同摸索——從善書到小說的敘事分析，1895-1945》一書作為參照。方孝謙的論著不僅出版時間與荊書相近，甚至連書中的主要論點也令人驚異地類似。方氏藉由班迺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對臺灣民族主義發展的觀察出發，不約而同地推導出和荊氏近乎一致的結論，即：日治時期誕生的臺灣民族主義論述，仍然處於一種曖昧而游移不定的狀態。只是方孝謙更明確地強調日治時期的「殖民地民族主義」對戰後民族主義發展沒有直接影響。[8]但更重要的是，兩位作者之間差異的關鍵不在結論，而在分析途徑的設定上。如果說荊子馨還是以傳統政治意識形態為劃分標準，由此論證當時臺灣人認同的模糊狀態，但這種方式卻隱含著臺灣人已經同質化於西方式政治意識形態的預設。相對的，依據方孝謙透過查特基（P. Chatterjee）後殖民理論的觀點，並借用語言學概念，更深一層地呈現出 1920 年代末期以前，包括一般民眾在內的臺灣漢人對於民族想像與認同，仍處於高度游移不定而模糊的狀態。[9]也就是說，縱然當時臺灣知識分子試圖建構起一套臺灣人休戚與共的「想像的共同體」，但知識分子卻對臺灣人身分認同沒有一條明確邊界的共識，更不用說一般社會大眾，到底有多少人真的瞭解這種以西方國族主義為概念的臺灣人想像？由此可知，荊氏的分析模式，僅能說明日治時期臺灣部分知識菁英自我認同的曖昧性，卻不能貼近一般群眾深層的認同意識，其與事實的落差不可謂不大。雖然筆者對日治時期臺灣原型民族主義的出現，到底和戰後臺灣民族主義有多

8 方孝謙，《殖民地臺灣的認同摸索》，81、121。

9 方孝謙，《殖民地臺灣的認同摸索》，86~120。

少關連性不預設任何立場，但從荊子馨與安德森、方孝謙等人表面看似同質，實則底蘊大相逕庭的論證途徑，更不用說和吳叡人等學者在相同議題上截然不同的對立解釋，[10]更可看出此一關鍵議題的複雜性。

另外，在第三章探討同化與皇民化政策的差異性中，針對周金波（1920~1996）、陳火泉（1908~1999）等人作品中呈現之高度爭議性的認同衝突，作者很明顯地忽略了陳培豐在 1999 年即已完成的博士論文，同樣也指出了上述文本背後隱含極其複雜的認同掙扎。[11]事實上，《成為「日本人」》的問題不只如此，因受到作者成書時的視角與關注課題的框限，使其論述存在著某些侷限性。同樣是皇民文學家認同困境問題，荊子馨引用了文本之後，就直接跳脫到上層結構，與詮釋文本的垂水千惠及星名宏修等戰後文學研究者們討論起皇民化的本質究竟是什麼？但對陳培豐來說，戰後文學研究者雖然也出現在他的分析視角中，但對於探討主體的皇民化問題，他卻回歸到歷史脈絡中，藉著綿密的文本背景的時空分析，深刻地重建皇民文學家生命歷程的親身體驗對寫作意識的影響。另一方面，在方孝謙的論著中，也藉由海登・懷特（Hayden White）的喻格（trope）理論，透過皇民化時期小說中針對庶民生活的描寫，以及對當時知識青年認同經歷的巨大轉變，呈現出日治時代末期漢人認同的劇烈兩極化現象。[12]

或許，這種不同的論述方式是歐美式及日本式學院在研究取徑、學科分類等方面的差異所導致。不過，由此卻可進一步發現《成為「日本人」》在論述上亟需補強的地方，也就是全書雖然宣稱要破除後殖民時代國族認同對歷史研究的後設式影響，但實際上卻隱藏著去歷史化及去脈絡化的危機。其實，這問題在前面討論本書與方孝謙對於日治時期臺

10 吳叡人，〈臺灣非是臺灣人的臺灣不可：反殖民鬥爭與臺灣人民族國家的論述，1919-1931〉，Paper prepared for the Third Annual Conference on Democracy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 Harvard University, November 1999)；〈福爾摩沙意識型態——試論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民族運動「民族文化」論述的形成（1917-1937）〉，《新史學》17 卷 2 期（2006，臺北），127~218。

11 陳培豐論文中文版及相關討論內容，請參見陳培豐著，王興安、鳳氣至純平譯，《「同化」の同床異夢》（臺北：參田出版，2006），442~458。

12 方孝謙，《殖民地臺灣的認同摸索》，127~174。

灣人認同本質為何的論證方式差異時即可略見一二。不特如此，本書論證去歷史化的缺點不只一處，通貫全篇所引用的史料，大多為文學著作或時人評論，但不論是研究日本殖民帝國的本質，臺灣做為殖民地的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狀態，還是皇民化運動下臺灣人被迫接受單一認同的現實，以及原住民形象如何被重構的過程，僅透過小說文本、經過篩選的報導或二手研究，並不能真正貼近當時歷史事實的脈絡。總之，本書未能進一步的利用當時殖民政府遺留的大量統計資料、官方文書、學校教材等，以更精確地解析殖民體制對形成臺灣人意識過程中所產生的關鍵性作用，殊為可惜。其實近年來臺灣本土的後殖民研究領域中，這類宣稱為「歷史研究」，實則脫歷史化、脫脈絡化的論述並不罕見，很可惜的該書也不能完全擺脫類似問題的影響。

因此，個人認為《成為「日本人」》雖然提出了一套基進的論述，試圖釐清日治時期五十年統治下，殖民體制對臺灣認同的形塑，並藉以批判日本殖民主義。但在其整體架構上，卻未能進一步貼近歷史脈絡，對殖民體制作更深入、細緻的評價，反有淪為某種教條式反帝國主義意識形態之虞。此外，本書對臺灣在地歷史學研究成果的忽視，也造成作者試圖開展出某種上層結構敘事的同時，卻也隱藏著得面對其他研究者質疑的隱憂。

（二）殖民史研究方法論上的新取向

在指出本書部分有待商榷之處後，筆者將要從本書所關懷的立場上，提出臺灣史研究可能拓展的新面向。從薩伊德（Edward W. Said，1935~2003）的《東方主義》（*Orientlism*）開啟後殖民研究的熱潮以來，有關後殖民理論的學說架構，即透過英美學院向世界各地，特別是第三世界傳播，具有實際被殖民歷史經驗的臺灣，當亦無法自外於潮流。特別是關於日治時期及戰後臺灣史的領域，新一代研究者利用後殖民理論，試圖為日本殖民體制對臺灣造成的結構性影響，乃至戰後去殖民／再殖民化過程中的衝突，以及殖民統治的後續效應提出詮釋。《成為「日本人」》這部作品也不例外，作者純熟地利用他在美國學院中所接觸的

後殖民研究第一線成果，提出對日本殖民主義本質的解釋。細讀該書的內容可以發現，作者成長過程中，處於多元族群的生活環境，移居各處的離散經驗，影響所及，使作者對日治時期臺灣文學作品中蘊藏高度流動性與不確定性的特質，具有敏銳洞察力。在前述訪談中，作者也提到因這種離散經驗所構成的問題意識與關懷。[13]另一方面，作者長年旅居日本的親身經驗，也使得作者把關注與對話的焦點放置於日本在臺殖民論述的分析與批判上，希望藉著揭露日本殖民者透過塑造「臺灣人」、「日本人」對立的他者形象，及其所代表的強迫性認同手段，來反思殖民主義對臺灣社會文化形構的重大影響。

既然作者認為當今所謂的「臺灣認同」，或是「臺灣人意識」，其實是日治時代殖民政府挾西方近代國族主義的自我／他者觀念，透過有形與無形的宰制力量，強壓在被殖民者身上的現代性產物，而需要進一步的反思。那麼，在此我們必須進一步追問：在一味的去國族、去殖民之外，還有什麼更具有行動力的策略來解決現今臺灣乃至東亞世界所共同遭遇的困境？或者更直接的說，如果一切都是數十年前殖民者所灌輸、遺留給我們的虛幻感覺，我們為什麼不敢直接推翻所處的現代世界？答案很簡單：正因為以國族主義為基盤的現代性論述已經成功且深入地建構了我們所生存的當代世界，所以沒有人願意、也不可能將時鐘撥回前近代的原點。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要如何實踐去殖民化以及去國族主義化？事實上，這是文學或社會科學出身的後殖民研究者所難以回答的問題。因為當他們在嘗試進行去殖民意識形態的同時，也不自覺地將自身的論述去歷史化以及去脈絡化，結果除了用大量生澀、晦暗的後現代用語裝飾文本之外，他們的作品已經脫離歷史發展的脈絡，成為個人主觀意識自我表述的場域。是故，筆者認為，《成為「日本人」》確實成功地解構了殖民主義建構臺灣人百餘年來意形型態的策略，但要如何提出一套歷史化、脈絡化的殖民文化史研究新論述，卻有未竟其功之處。

在筆者看來，臺灣的後殖民研究未能與傳統東亞歷史學研究真正接

13 柯裕棻，〈去殖民與認同政治：訪談《成為「日本人」》作者荊子馨〉，《思想》2，256~267。

軌，是其理論的缺憾之處。這裡所指的缺乏接軌，並不是刻意忽視臺灣後殖民研究者廣泛地與日本、中國乃至東南亞各國同領域學者交流的事實，而是指他們應強化與歷史學，特別是東亞史領域的橫向聯繫。目前臺灣後殖民研究與歷史學的互動範圍，基本上仍不脫日治臺灣史的框架，既然這些解構國族論者關懷的焦點在東亞，[14]或者更精確的說就是今天的臺灣、中國、日本及朝鮮半島，那麼就不應該將殖民主義的影響，去歷史化或脫脈絡化地抽離至單獨的場域，更應該進一步的追問：以傳統儒家天下秩序建構而成的前近代東亞世界，到底有多少思想資源，其實被殖民體制所吸收並承繼？

答案或許就在原作者本人的研究領域中。本書封面摺頁作者簡介中所提的研究興趣，包括：「後殖民主義、亞細亞主義、大眾文化等」（底線為筆者所加）。筆者在看到這段敘述時，才驚覺作者未能將他在亞洲主義領域的研究知識整合進《成為「日本人」》之中；相反地，為了推翻日本殖民主義在意識上不具備特殊性的預設，卻也一併放棄了對亞洲主義與近代日本殖民性進行更深入探討的可能。與此相對者，卻是歷史學研究中，自 1980 年代末溝口雄三《作為方法論的中國》、《アジアから考える》等書陸續出版後，[15]帶動了東亞史學研究去自我中心化、以被研究者主體立場重新審視、評價歷史的趨向。另一方面，在東亞現實政治、經濟乃至文化交流整合日趨緊密的走向下，以亞洲作為新「想像的共同體」之呼籲亦多有所聞。所以對於東亞歷史的再認識，特別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所謂「亞洲主義」（アジア主義）的再評價，應有其實際的必要。固然，以日本為主體的亞洲主義，經日俄戰爭及一次

14 「東亞」作為地理概念，大致上指涉今天中國大陸、朝鮮半島、日本及越南等地。不過，「東亞」一詞也是十九世紀受到西方世界觀影響下的產物，子安宣邦在《東亞儒學：批判與方法》的第一章中，便已指出日本「東亞」概念的出現背後，隱藏了東方／西方、自我／他者的對抗性意識。但子安宣邦亦指出了「東亞」概念有超克狹隘的國族主義對抗觀或帝國主義策略性虛構論述，從而成為亞洲各國多元文化相互理解的超越性方法論的可能性。子安宣邦著，陳瑋芬譯，《東亞儒學：批判與方法》（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1~18。

15 溝口雄三等編，《アジアから考える》（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3~1994）。

大戰後，逐步變質成為日本帝國擴張的宣傳工具，甚至衍生出極具帝國主義性的大東亞共榮圈概念。[16]而戰後自竹內好（1910~1977）以降的批判中，更直接指出「亞洲主義」的概念，其實是十九世紀末東亞世界受西方壓力被迫開港後，一種為區別與西方不同的自我／他者認識論下，所形成的近代性產物。[17]但既如前述，構築現代世界的意識已如此地牢固滲入社會之中，那麼在去殖民化的過程中，勢必要正視現實西方民族主義概念所造成的影響。因此，只有回歸前近代東亞世界的歷史連續性，並藉由對東亞文明圈內各個成員之歷史獨特性的互相尊重及理解，[18]加上對現實局勢的理解，才有可能真正消弭西方國族主義意識形態，以及日本殖民主義自十九世紀以來影響亞洲地區迄今的巨大認同焦慮與對立意識。要之，原型亞洲主義背後蘊含以儒學天下觀為基礎的平等或互助理想，[19]是有可能與東亞後殖民研究相連結，進而構成真正具有歷史性的理論架構。總之，如何從亞洲主義中理出具有超越性的思想精華，以作為化解二十世紀前半以降遺留在東亞殖民效應的新動力，同時將日治臺灣史真正放置於東亞歷史變化的複雜情境中，才有可能實現吳濁流六十年前勇敢嘗試，卻未能真正越過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三條軸線的理想（頁 268）。

---

16 高坂史朗，《近代という躓き》（京都：ナカニシア，1997），157~158。

17 竹內好，〈アジア主義の展望〉，《アジア主義》（東京：筑摩書房，1963），1~63。

18 此處的論點如，陳光興等人亦有類似主張，但陳光興的「亞洲作為方法」理論雖然宣稱是對溝口雄三的回應與對話，事實上他仍然是把臺灣乃至亞洲放在去歷史化的脈絡之下，忽略了理論架構與歷史事實上存在的差異，使其理論的說服性大為降低。陳光興，《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臺北：行人出版社，2006），391~418。

19 「原型亞洲主義」的概念始自竹內好，主要是指十九世紀末由日本的樽井藤吉《大東合邦論》首創，繼之岡倉天心《東洋の理想》深化，以及中國梁啟超、章太炎、孫文先生等人所提倡，而非 1910 年代後被日本擴張主義迅速整編、工具化的亞洲主義思想。基本上這種思想雖然存在著某種亞洲人同為一體的本質論想像，但在原型亞洲主義思想脈絡中，蘊含以儒家思想為脈絡的天下觀，卻的確是前近代東亞知識分子所共有的思想資源。有關亞洲主義生成與傳統天下意識的關係，請見桂島宣弘，〈アジア主義の生成と轉回——德川思想史からの照射の試み〉，《思想史の十九世紀：「他者」としての德川日本》（東京：ぺりかん社，1999），196~231；竹內好，〈アジア主義の展望〉，《アジア主義》，18、32~37、42~44。

四、結語

「臺灣人是什麼？」這個問題在當今國族認同紛亂的時代，不僅是每一個居住在臺灣的個人必須面對，其實更是從日治時代以來，做為被殖民者的「臺灣人」被迫回答的難題。在日本統治時代，作為被殖民者，臺灣人自我認同的來源，很弔詭地居然是殖民者有意無意所給予的。特別是在皇民化運動時期，當一切身分曖昧的空間遭到封殺，「臺灣人」變成了成為「日本人」之前的不完美階段，但殖民者卻未曾明說的是：「臺灣人」註定不能成為「日本人」。給予被殖民者美麗的願景，只是將他們誘入一個猶如薛西佛斯神話一般，不斷重覆、卻永遠沒有終結的冷酷遊戲，從而維持殖民者支配地位，這就是《成為「日本人」》帶給我們的啟示。

綜觀荊子馨的作品，雖然在許多論證與分析上仍有待辯證，但字裡行間，卻很明顯地呈現了作者的關懷立場。也就是透過後殖民理論的分析架構，以及針對日治時期各個文學作品的文本分析，重新發掘被埋藏在後殖民時代種種喧譁理論與意識形態下，隱晦而不為人知的殖民主義的本質。而另一個重要目的，是在親眼目睹戰後不同歷史記憶族群的衝突與緊張關係，以及臺灣現時二極對立的局面之中，希望藉由與臺灣史及臺灣文學研究者中最激進二端的對話，從中找出一條現實性的折衷妥協之道。但進行去殖民的同時，要如何顧及臺灣人主體的尊嚴，以及尊重擁有不同歷史記憶者的立場，卻又是另一個需要深思的課題。更重要的是，這樣勇於跨越鴻溝的企圖，勢必會遭到立場截然，且本質上都帶有極度自我／他者區別性意識的國族主義者的強烈批判吧？

行文至此，我認為該書作者就像是在狂風暴雨時刻，卻大膽地行走於架設在萬丈深淵之上、搖搖欲墜且狹窄難行的吊橋的旅行者，只因為滿懷著信心與希望，不畏一切艱險，朝著理想新世界的彼岸奮勇前行。或許這旅程孤寂而漫長，甚至可能會被峽谷兩端夾擊的暴風吹落深谷，但每向前挺進一步，就代表我們離那古老殖民束縛的陰影更遠了一步。

（責任編輯：李修平　校對：呂雅婷）